

福岛核事故受害者求助无门的背后

饭馆村,距福岛核电站约40公里。记者驱车来到这里,眼前几乎是恐怖电影里的“鬼城”:人迹寥寥、杂草丛生、污水遍地,只有乌鸦的叫声偶尔刺破寂静。

日本摄影家飞田晋秀30多次深入灾区,用镜头记录这一幅幅景象,镜头后的他时常潸然泪下,但更多时候,他感到的是“怒火中烧”。

让飞田愤怒的是,他目睹核事故后罹患甲状腺癌的灾民承受着痛苦与孤独,却求助无门。为此,飞田与朋友们一起,共同发起了“3·11 甲状腺癌家族会”。

灾民孤立无援

“在福岛,甲状腺癌患者的家庭承受着痛苦与孤独,他们无法将孩子的病情向亲友诉说,也不想跟孩子说核辐射的事,”飞田说,“因为担心遭受各种外来压力,家长们不愿也不敢公开自己姓名。”

2015年6月,飞田在福岛遇到一名患甲状腺癌的女孩。核事故发生时,她正在学校参加毕业典礼。事故发生后3天内,她待在家里没有出门,后来为订制高中校服随母亲去商场,因故在商场外等了三四十分钟,当时两人都没戴口罩。

她高二体检时,发现甲状腺检测结果异常,随后确诊为甲状腺癌。高三暑假时,接受手术切除了右侧甲状腺和部分淋巴。大学入学体检中再次出现异常,随后发现是甲状腺癌复发。当年10月,她退学接受手术,摘除了

全部甲状腺。

她说,成为一名设计师一直是自己的梦想,没能实现这一梦想十分不甘。而让她父母更加愤懑的是,孩子身上发生的悲剧至今无人负责,他们被告知这与福岛核事故没有因果关系。

与这名女孩有同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据统计,截至今年2月,福岛县共有166名青少年被诊断为甲状腺癌或疑似甲状腺癌,其中116人进行了手术,手术患者中又有几名被确诊癌细胞转移。

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津田敏秀等人2015年在国际医学杂志《流行病学》上发表论文指出,受福岛核事故泄漏大量放射性物质影响,福岛县内儿童甲状腺癌罹患率是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到50倍。

可是,今年2月15日,福岛县政府和福岛大学公布分析结果,拒不承认核事故与甲状腺癌病发之间存在联系。

“目前日本政府没有任何针对灾区儿童健康问题的对策,”飞田说,希望日本政府能汲取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教训,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舆论避重就轻

在饭馆村,记者看见两名身着工作服、手持辐射测量仪的工作人员在农田里工作。当记者接近时,他们其中一人警觉地收起了仪器,另一人则走过来让我们尽快离开。

工作人员的敏感反应,与记者在灾区的

其他见闻一样,都给人感觉这里似乎有颇多“秘密”。

同样奇怪的是,在关系民众健康的这一重大事件当中,发达的日本媒体居然“不约而同”选择沉默,而对于同为7级核事故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些媒体却持续报道。

日本民间团体“切尔诺贝利受害者调查与救援女性网络”事务局长吉田由布子,比较了日媒对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事故的不同报道姿态。她指出,过去30年来,日本主流媒体持续关注 and 调查报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切尔诺贝利再获日媒关注,但几乎看不到日本主流媒体在以往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调查采访经验基础上,对福岛核事故的健康危害进行深入调查和报道。”

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也存在类似气氛。津田敏秀等人在《流行病学》发表的那篇论文,至今没有引起日本政府和福岛县的重视,反而招致反驳和批评。

政府逃避责任

“国家的遗忘意愿”——法国《世界报》3月的一篇相关评论,给日本政府应对核事故的“心思”做了总结。

人们希望灾难那一页尽快翻篇,但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现实,以什么样的出发点去处理善后。

日本儿科医生、切尔诺贝利儿童基金顾问黑部信一曾走访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疗养设施。他指出:“如果按日本政府目前的

处理方式,30年后,福岛核事故造成的健康危害可能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大。”

在灾区的实地采访中,让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农田里摆放的黑色口袋。这些口袋里装的都是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垃圾。有些地方,这样的口袋就像堡垒一样堆放着,难以计数。然而,处理这些核污染垃圾的设施数量至今还远远不够。

除了核污染垃圾处理厂,黑部介绍说,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比,福岛核事故后建成的相关疗养机构过少。“哪怕只在疗养所疗养4周,体内放射性物质铯的水平也会降低30%,可见疗养设施对于受害者恢复健康十分重要。”

黑部同时指出,本地的低收入者因为买不起外来的无辐射农副产品,也无钱送孩子去疗养所进行相关治疗,更容易受核辐射威胁。“他们本来应该向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追究责任要求赔偿,但就现状而言,政府和相关机构都不愿意制定对它们自己不利的政策。”

日本民间环保组织“FoE Japan”理事满田夏花则对日本政府加速福岛核灾民返乡的新政策非常不安。

核事故原因尚未判明,事故追责稀里糊涂,辐射风险居高不下,就让灾民返回已被污染的故乡?满田夏花愤怒地说:“政府打着灾后复兴的旗号,实际干的事却是抛弃核灾民,试图封杀健康风险的真相。”

(执笔者刘石磊,参与记者刘秀玲、华义、刘天、张继业) 新华社东京5月25日电



在30年前发生过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最严重事故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有一座为日本福岛核电站祈福的纪念碑。新华社记者戴天拍摄

日本法院再判东电赔偿

福岛核事故受害者家属

据新华社东京5月25日电(记者沈红辉)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5日认定福岛核电站附近医院两名患者的死亡与福岛核事故有关,判处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受害者家属约3000万日元(约合179万元人民币)。这是日本法院今年4月以来第二次对此类索赔案进行判决。

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因地震和海啸发生核泄漏,核电站附近双叶医院的大批住院患者被迫疏散避难。97岁的患者藤吉正三和一名86岁的患者在转移一天后死亡。

此后,两名死者的家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福岛核事故导致两人被迫疏散转移,无法获得及时救助,最终导致死亡。死者家属要求东电公司赔偿约6600万日元(约合393万元人民币)。

东京地方法院在25日的判决中说,核事故是造成两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两人临终还无人陪伴,承受了较大的精神痛苦。

据日本媒体报道,双叶医院至少有44名类似住院患者在核事故后死亡,其中7名死者的家属已向东电公司提出索赔。今年4月,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就此类案件进行宣判,两名核事故受害者家属获得约3100万日元(约合185万元人民币)赔偿。

警惕“福岛后遗症”的“全球化”

福岛核事故的后遗症,有多少是人为掩盖而引发的?如果不直面国际社会的质疑,“福岛后遗症”会让更多国家受害,最终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长期顽疾

关数据的分析研究,直接影响灾后处置工作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

可是,如何获得准确数据,国际上许多专家都有类似的无奈答案:“这个嘛,没资料啊,不好说。”

没有一手资料和独立机构的调查,就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在如此重大、影响深远的核事故面前,无论对于受影响的国民还是国际社会,日本政府“淡化”处理的行为已引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质疑和不信任。而一味“捂盖子”,只会捅更大

篓子。

比如,韩国等日本周边国家民众对日本食品的高度警惕甚至抵制,近乎酿成国际贸易纠纷,这正是周边国家对日本核事故处理高度不信任的写照,也是“福岛后遗症”国际化的又一证明。

尽管日本称已经在食品产地标识、辐射检验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不时曝出的福岛核事故处理中的种种不靠谱,又如何让日本说服世界?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全世界都以

为深重的灾难给人们上了一堂不会忘记的课。但如今,当年的一些错误做法还在继续。

日本拒绝了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学会等机构的调查申请;东京电力公司给出的治污数据漏洞百出,甚至出现迟报堆芯熔毁这样严重的情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申奥陈述时向全世界夸口核污水“得到控制”、“完全没有问题”,事后证明核污水外排或泄漏仍在继续;对福岛灾民求助无门现象和核污水处理情况,日本媒体要么选择沉默,要么语焉不详……

种种事实,让人不免要问,福岛核事故的后遗症,有多少是人为掩盖而引发的?如果不直面国际社会的质疑,“福岛后遗症”会让更多国家受害,最终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长期顽疾。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记者杨骏、黄翌)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安倍政府操控媒体引发国内外舆论批评

新华社东京5月25日电(记者沈红辉)日本政府长期标榜“新闻自由”,大肆宣扬“自由民主价值观”。记者近日采访调查了解到,在多名日本媒体界人士和驻日外国记者眼中,日本政府一直通过“无形的手”影响着媒体,特别是安倍政府上台后,这种操控变本加厉。

今年年初,日本电视界多档时事节目主持人或评论嘉宾被调离或遭雪藏。4月,朝日电视台一档以批评安倍政府著称的时事节目主持人突然“下岗”。早在2015年,该节目一名自由派评论嘉宾在直播时突然曝光安倍政府对节目施压内幕,引起日本国内外广泛关注。

以上只是安倍政府限制媒体的最新注脚。近年来,安倍政府一直通过法律、恫吓等手段间接或直接影响媒体。

2014年,迫于政府压力,日本《朝日新

闻》被迫撤回引用已故民间人士吉田清治证词作出的“慰安妇”相关报道,受到重创。

2014年12月,声称“旨在强化内阁对军事、外交等国家机密事项的管理,加大对公务员泄密惩罚力度”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正式实施,媒体受到牵连。同年年底,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前向各大民营电视台下发通知,要求有关节目在内容、邀请嘉宾等各方面保证所谓“公平性”。

今年2月,安倍政府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称,如有电视台违反放送法规定的“政治公平”原则,将事实上关停该电视台,电视台是否遵守规则由政府定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媒体资深人士对记者说,“批评安倍的媒体人从荧屏上消失是不争的事实”,遭撤的媒体人多数在新安保法、核电政策等敏感问题上和安倍政府唱反调。

媒体人认为,在安倍政府高压政策下,日本新闻环境趋于恶化,日本媒体危机感强烈,以至于不敢触碰敏感议题,发出不同声音。这种状况招致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批评。

日本新闻行业工会组织“日本新闻劳动组合联合会”委员长新崎盛吾以《朝日新闻》为例表示,2014年“慰安妇”报道事件后,《朝日新闻》开始回避敏感议题和批判性报道,其受到打压让日本媒体界产生了强烈危机感。

谈到《特定秘密保护法》,新崎说,该法实施一年多来,日本新闻工作者明显感受到采访难度加大,防卫省等部门公务员因害怕被处罚而普遍拒绝采访,不再提供信息。该法同时处罚媒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信息,但未明确到底哪种手段非法,致使很多媒体不得不自行自我审查。

新崎认为,安倍政府对媒体的压制看上去虽仍处于口头警告阶段,但这种恫吓已经

起作用。目前,日本媒体“自我审查”风气日盛,开始刻意避免敏感议题,不敢发出不同声音,以免惹麻烦,“这种状况值得担忧”。

冲绳媒体《琉球新报》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批评安倍政府的政策,该报编委新垣毅对记者说,在政府默许下,《琉球新报》在互联网上受到右翼恶意攻击,该报驻东京记者正常生活也受到影响。

联合国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戴维·凯对日本新闻自由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日本媒体记者对政府压制舆论感到担忧,“日本新闻自由面临严重威胁”,他呼吁日本政府采取措施保障新闻独立性和公民知情权。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日记者卡斯滕·格米斯撰文指出,他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批评安倍政权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文章后,日本官方向日该报编辑部“抗议”,他指出,安倍政府对批判报道的“高压”态度正在日益强化。

在日本,受歧视的本国特定人群主要是“部落民”和阿伊努人

如果说对本国族群还只能算是“隐形歧视”的话,日本国内针对外来族裔和在日外国人,特别是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人士的歧视则更为公开

在日本互联网上,支持右翼作家曾野绫子的声音竟然占压倒性多数,多数网民认为应该坚决拒绝外来移民

最近,记者在日本四国德岛县采访时发现,县政府附近竖着一块写有“消除对部落歧视”字样的巨大宣传板。这块宣传板告诉人们:在日本,针对特定人群的歧视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社会“温情脉脉”面纱下隐藏着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这一毒瘤不仅在日本国内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也导致日本与邻国难以和谐共处。

歧视现象司空见惯

在日本,受歧视的本国特定人群主要是“部落民”和阿伊努人。

“部落民”指的是明治维新前即存在的所谓“贱民”——在日本封建社会身份等级制度中处于最底层,主要从事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职业,在服饰和居住上受到各种限制。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宣布废除“部落民”制度,然而时至今日,在婚姻和就业等方面,对“部落民”出身者的各种歧视依然存在。在互联网上,不时可以看到有人倾诉因家庭反对而无法与“部落民”出身者结婚。

阿伊努人是曾经广泛分布于北海道和东北地区的土著居民,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和自己的语言。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移民大力开拓北海道,对阿伊努人长期实行欺压和同化政策。直到现在,歧视阿伊努人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北海道,只有约2.4万人承认自己是阿伊努人,很多阿伊努人因担心遭到歧视而不敢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

如果说对这些本国族群还只能算是“隐形歧视”的话,日本国内针对外来族裔和在日外国人,特别是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人士的歧视则更为公开。一些右翼团体经常在街头举行针对邻国人士的排外游行,公然叫喊带有侮辱性的口号。日本最大论坛网站“2ch”上也充斥着排外言论,其中对中国人、朝鲜人和韩国人的歧视言论尤为突出。

右翼思想大行其道

上述歧视现象与日本右翼思想关联密切。除历史上“神国观念”“皇国史观”外,最主要的右翼思想就是所谓的“大和民族优秀论”。日本右翼势力认为,邻国的“劣等民族”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国家,日本当年殖民和侵略反而是在“帮助”这些民族。这一论调不仅是对侵略行径的美化,更是对亚洲邻国的蔑视。由此滋生出的歧视、排外思想随着媒体的传播而在日本大行其道。

去年2月,《产经新闻》刊登曾野绫子有关接纳外来移民的专栏文章。这位右翼作家扬言:“当年南非实行白人、黑人隔离居住的做法很好,值得日本借鉴。”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南非方面抗议。

南非驻日本大使专门致函《产经新闻》,明确指出:“种族隔离是反人道的犯罪行为,在21世纪更不能将其正当化。无论世界哪个国家,都不应基于肤色或其他分类标准来歧视其他人。”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日本互联网上,支持曾野绫子的声音竟然占压倒性多数,多数网民认为应该坚决拒绝外来移民。这一现象表明,种族歧视和排外思想已经深植于日本社会。

种族主义日趋严重

日本国内种族歧视问题曾多次引起联合国关注。2005年11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有关消除全球种族主义的报告中呼吁日本政府正视种族歧视问题,并为解决问题作出努力。

报告指出,日本国内受到歧视的人主要是当地少数民族、韩裔、华裔以及来自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的移民。日本国内对种族歧视的历史和文化根源缺乏认识,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围绕如何编写日本某阶段的历史,尤其在涉及日本与朝鲜、韩国和中国等邻国的历史关系问题时反复出现争议;二是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多次发表排外和种族主义言论;三是日本缺乏针对种族主义、歧视和排外问题的全国性法规。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滋长,日本社会种族歧视和排外问题不但未能改善,反而更加严重。现任首相安倍晋三重新上台执政后,与其“志同道合”的右翼学者极其活跃,日本政治和社会气氛也在发生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右翼言论,强调日本文化和大和民族优秀的种族主义色彩更加浓重。

观察人士指出,认为自己理应领导亚洲的种族主义情结,使得日本难以接受邻国取得的发展成果,导致日本与邻国龃龉不断,而这也是日本无法走出历史认知问题死结的重要原因。(记者蓝建中)新华社东京5月25日电

国际观察